

憚彼聽證增我惕勵

曾虛白

(一) 聽證導因

跟我們中華民國共甘苦同患難差不多一世紀的盟邦美國現在竟想背棄我們，去跟我們的叛逆另訂新歡。爲了這個問題，美國衆議院在民國六十六年九、十月間邀請專家學者開聽證會，慎重研討實踐這決策的影響。五閏月來，筆者注意這事件的發展，謹就所集資料，追溯其成因，分析其內容，檢討其後果，期與國人在這一陽初復萬象更新的新年，共增對當頭國難的警惕以自勵。

美國變節的始作俑者是水門事件垮下台來的總統尼克森。當卡特總統接過棒來辦這對華外交任務時，美國雖已有兩個總統一個國務卿訪問過匪幫，但對匪關係，除了「上海公報」這一份雙方各說各話的共同聲明之外，美國還沒有做過任何具體的承諾。主要關鍵在「關係正常化」與「建立外交關係」，「上海公報」故意把它們分成涇渭不相混淆的兩件事。在「上海公報」中，美國雖贊成與匪關係「正常化」，可是緊跟說明，美國人看到台灣海峽兩方面的中國人都堅決主張中國祇有一個，美國人同意這樣看法，但，美國人不願表示這個中國究竟屬於那方面的。這一段說明無異把與匪「建立外交關係」從與匪「關係正常化」中劃分了開來。

不料卡特與范錫接棒辦外交，一下子就把這兩件事併爲一談，竟把美國與匪「關係正常化」就算做是「建立外交關係」。范錫六十六年二月廿九日在紐約亞洲協會演說作首次暴露，卡特在同年六月三十日招待記者，竟坦白承認美國對匪「關係正常化」已經有了承諾，必須履行。這無異公開宣布與匪建交是他的決策。

實際這的確是非正式宣布美國政府對華決策的一次故意的安排。因爲

，與匪建交是美國政府一個專案作業小組所作方案的結論。這個作業小組受命草擬對華政策，其執筆者爲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萊天惠與白宮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柏。這方案的編號名稱爲「總統核閱備忘錄第廿四號」！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國策檔案中的一件，亦即該委員會提供總統作國策抉擇時的參考文件。這號備忘錄的主題是「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美國新聞界透露其內容綜合成下列兩點：(一)確認接受中共所提三條件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即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爲卡特政府對華政策進展的目標；(二)確保台灣人民的安全爲美國應負的責任，與中共調整關係正常化時必需兼顧這個原則，至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則可以其他有效方式取代之。

「備忘錄第廿四號」是機密文件，美國政府始終沒有公布過，但在美國國會裡却已經成了一個熱門談論的問題。因爲，卡特接受了這備忘錄之後，就指定一個五人小組將其內容有組織有計劃地向美國國會中的重要議員作秘密簡報，進行說服工作，希望兩院能夠同意通過這對華新國策。這五人小組的組成份子，除原方案的起草人萊天惠，與奧克森柏以外另外三人爲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李文與國務院中共事務科科長宋賀德。因爲他們在國會裡的活動，這文件的內容才洩漏給了新聞記者。同時，這一內容的洩漏，證明了范錫六月廿九日的演說，卡特六月卅日的記者招待會，是有計劃的一套安排，要把卡特的對華新政策，非正式公之於世。

引發了美國國內不約而同的民意抨擊。最使卡特感到警惕的，是「政策決定資料中心」與「波多馬各協會」聯合舉行的一次民意測驗，反映了美國人民對這問題的態度。這測驗表示美國人民絕大多數（高至百分之七十七），反對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犧牲了中華民國，同時這測驗更顯示美國人民超過半數以上厭惡中國共產黨，多數主張，即不得已而有與中共建交的必要，仍必繼續維持與我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范錫是帶著這份警惕心情去訪問匪幫的。他在中國大陸跟華匪國鋒，鄧匪小平，黃匪華，舉行一連串的會談，一切好像進行得相當順利。記者們的報導也反映出足令白宮欣慰的氣氛。因此，他返美時，卡特總統親迎機場，誇耀他此行「異常成功」，是「關係進展的一項重要步驟」。

不料美國的一團高興，不久就遭匪方兜頭的幾盆冷水。李匪先念先向美記者表示，匪方對卡特所持台灣態度深感不悅。接着鄧匪小平又向美記者表示，與范錫會談是美匪關係的委縮，范錫立場竟是福特總統建議的撤退。他表示，福特已承諾美國將與中華民國絕交，並廢除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再隔幾天，鄧匪小平又向記者透露，竟說范錫曾經建議，

美國與匪建交之後，擬在台灣設立類似現在北平的「聯絡辦事處」與台灣維持關係。鄧說，這建議也給他拒絕了。福特聽到了鄧匪發言，牽涉到他自己，立刻發表聲明，否認他曾有與中華民國絕交的企圖。但他承認他曾告訴匪方，美將考慮「日本模式」以解決「台灣問題」。至匪方所述范錫曾表示美方想把美國與「我」「匪」的關係現狀換個位經匪方拒絕一說，迄今未見范錫有何表示。綜合研究范錫返國後，美匪間舌劍唇槍的心戰辭鋒竟透露了美匪交談中，美方委屈求全所取低姿態的醜態。福特總統曾經要求匪方接受「日本模式」來解決「台灣問題」，范錫也會建議以派大使赴北平交換「聯絡辦事處」設在台灣，來解決這個問題。可惜匪方仍不能諒美苦衷，兩個建議都給拒絕了！再按這兩個建議都是所謂「備忘錄第廿四號」裡第一點實施與匪建交國務院擬訂的辦法，也就是美國官方進行這部份的外交談判所擬訂的腹案。我們從匪方這些透露中窺測到美方談判，肯把第一點所擬的腹案這樣一下子赤裸裸地攤給對方看，自可推想到范錫此行一定把「備忘錄廿四號」全部底牌，包括「以其他有效方式來取代中美共

同防衛條約」的建議，都攤給匪方看了。不幸，美方這樣坦誠相見，未得匪方的共鳴，攤出來的底牌全給斷然拒絕了。

問題分析到這個階段，癥結所在，已經攬得很明白了。卡特一方面決定與匪建交，一方面又要確保台灣的安全。前者的重點在求近利，後者的重點在求心之所安。換言之，目前祇是義利之辨引發了卡特的「大人交戰」，無法得其兩全。可是，幫助卡特決策的美國政客們並不死心，自信可以找到一條兩全其美的通道。這通道實在早已包括在他們所擬「備忘錄第廿四號」的設計中了，那就是：美國與匪建交之後，不必強求匪幫合作，來補救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失效的缺憾，盡可由美方單獨聲明，或以直接方式表示對台灣安全之負責，或以間接方式表示對亞洲或太平洋和平之關切。他們以為，祇需有這樣一次聲明，仍可取代共同防衛條約的功效而確保了台灣的安全。同時，他們又以為，要使這聲明發生跟共同防衛條約同等的效力，僅由總統出面來發表還是不夠的。總統的聲明必佐之以國會的支持，才使這份聲明具有堅強對外的折衝力量。

(二) 召開目的

問題發展到這個階段，才點到筆者要研究的本題。美國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所召開的「美匪關係正常化」的聽證會，才迎合現實需要應運而生了。這個小組的主席伍爾夫，本年八月四日在華盛頓召集一次記者招待會，發表了他個人召集聽證的意見。他以為，美匪關係正常化，必需給予台灣特別保證才能完成。所謂保證，他開列了下列四要端：

- (一) 在法律上，要完成一個對台灣安全的保證。
- (二) 在軍事上，要繼續供應台灣各種美製武器的零件。
- (三) 在經濟上，要讓台灣的經濟能繼續存在與發展。
- (四) 所有承諾做成前應該先與中華民國磋商。他坦白表示，等到九月國會復會的時候，他要綜合上述四點，提出一個「台灣安全決議案」，請國會通過以代替中美共同防衛條約。明顯地伍爾夫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中說明了他所召集的聽證會，目的在草擬一個「台灣安全決議案」，以備交國會通過取代中美共同防衛條約。

聽證在美國是國會裡經常舉行的一種集會，並不是怎樣特殊的舉動。

但伍爾夫這次召集的却有與衆不同的特點。因為，美國國會一般慣例，要聽證一定是審查政府所提的法案，藉以徵集各方面對這法案有關的意見，作爲集思廣益，考慮與修正這法案的根據。因此，一般聽證的動機是被動的。可是伍爾夫這次召集「美匪關係正常化」的聽證會，美國政府並沒有任何交議的法案，祇是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裡的一個小組看到這問題的解決，國會方面應該主動採取行動，才自告奮勇召開的。因此，這次聽證的動機是主動的。過去的聽證都是事後審查，這一次聽證却是事前建議。審查限於個案，範圍狹隘；建議涉及全面政治，可以無所不談。當美國白宮與國會爭權對峙鋒芒畢露的今日，伍爾夫這一手自有他盤馬彎弓的作用！他在記者招待會中公開承認說：「舉行這一次聽證會的目的，就在協助美國國會事先準備對付一項政策的變化，不是作事後的反應。」其用意在促使國會爭取主動的弦外之音，昭然若揭。

但在邀請來的專家學者未開口作證以前，伍爾夫先給他們規定了一個發言的限制。他說，「這個聽證會是一個研究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影響的聽證會。」有意無意之間，他以先入爲主的方式，規定了美匪關係正常化是已經決定的原則，不是這次聽證會要討論的問題。現在要討論的，祇是正常化帶來的不良後果，如何應付與如何清除。換言之，他看到了卡特既要想與匪建交，又不肯犧牲中華民國，因在義利之辨矛盾中，掙扎不出一條生路的死角中，福至心靈，決心要支助國會竄過白宮，提出好辦法，解決卡特解決不了的問題。可惜他的腹案，仍舊跳不出在「備忘錄第廿四號」，「以其他方式取代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原則範圍內盤旋設計。他在九月二十一日聽證會開了兩次之後，以召集人身份，更進一步說明了這次召集聽證會的意義。他說道：「目前一連串的聽證，主要目的是專爲國會和行政機構分析跟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實際含意。因爲跟中共『關係正常化』將引起條約與貿易關係等多種變化，國會和行政機構，應付這些問題，應作週全的準備。更應注意的，推行跟中共關係正常化，國會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國會除了舉辦聽證會廣集各方意見外，更要制定必需的法律，以助跟中共關係正常化實施時各方面需要的調整。」他這樣當場公開的說明，把他召集這次聽證會先定目標，再求配合的動機，解釋得

再清楚也沒有的了。

（三）內容分析

我們明白了伍爾夫這一次召集聽證會，是有目的的政治措施之後，現在要繼續研究作證者的作證內容，進而檢討其是否真能達成召集人期待的目的。

這次聽證會，是以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名義召開的。計自六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起，迄十月十三日止，召開了三次六場會議，每次二場。第一次九月二十日與二十一日兩場，第二次九月二十八日與二十九日兩場，第三次十月十五日與十三日兩場。據伍爾夫表示，這聽證會還要繼續舉行，聽聽政府方面的意見。據報他曾邀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數次皆以事忙未見出席。至現已舉行之六場，每場都有事先決定的討論主題，第一場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對全世界的影響」，第二場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有關的立法與法律問題」，第三場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應取的方式問題」，第四場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涉及的台灣問題」，第五場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涉及的經濟與貿易問題」，第六場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展望」。這些命題反映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爲既定政策之命意甚明。

邀請參加這次聽證會的專家學者計二十二人。就職業類別言，教授最多，計十三人，其中有華裔三人，哈佛大學幾佔全數四分之一，計有四人。在各種研究機構任研究員者人數次之，計有三人，計布魯金斯研究院一人，亞洲學社一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一人。再次前任公務員亦爲三人，計前任參議院領袖一人，前任參議院秘書長一人，前任美國駐華大使館副館長一人。再次爲無政治色彩具超然資格者二人，一爲華盛頓法律顧問公司國際私法專家名律師一人，一爲中華民國台灣省商總會會長一人。最後則爲美國國會現任議員二人，一爲參議員，一爲衆議員。

就伍爾夫所邀作證人的職業分門與專家類別方面估計，可說是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但再就質量方面作深入的研究，立刻發現他操縱的跡象。因爲，就機構性質來衡量，美國各大學中獨數哈佛爲培養左傾自由主義者

的溫床，醞釀對匪「關係正常化」思想的發源地，這次邀請的教授哈佛竟居四人之多。至研究機構，布魯金斯研究所是共匪在美代言人費正清門徒盤據的學府，亞洲學社更是公然以親匪為號召的巴奈德一個人掛招牌的研究機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立場也值得公正學人的懷疑。伍爾夫這次邀請的研究員，竟都在這三個機構中挑的，其用意可知。再就所謂學者平素對中國問題的態度來估計，其中如鮑大可、孔傑榮、范里奧、巴奈特、施高特、泰瑞爾這些人都是早已公開主張美國與匪建交的人，可是，平素主持正義不肯隨聲附和的人如周以德、饒大衛、林邁可、華克以及高華德等人，竟一位也沒有機會參加。難怪林邁可會慨歎地批評這一次聽證會祇能算是伍爾夫在美國給中國共產黨做公共關係工作了！

想不到伍爾夫這樣巧妙安排，竟沒有達成他預期為國會作週全準備的目的。先就全部二十二位專家學者發言表現的態度作統計，袒匪者十二人，而主持公道者竟也有十人之多，正反差距祇差兩人。故即就數量方面言，在聽證場上的氣氛，是對峙而不是召集人所期待的一面倒。更出於召集人意料之外的，聽證動機雖經召集人一再暗示美匪「關係正常化」為既定國策，非本次聽證討論的問題，不料作證者二十二人中竟有佔全數三又三分之二的六位之多，開門見山，在根本原則上反對美國與匪建交。此六人中無政治色彩為二人，一為華府法律顧問公司名律師狄盧，一為中華民國美僑總會會長溫嘉書。此六人中，又有現任美國國會議員二人，再巧也沒有，參眾兩院各佔一人，參議員是羅士，衆議員是奧可因。剩下來兩個人，一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辛頓，一是馬里蘭大學華裔教授丘宏達。綜合檢討這些原則上與本次聽證對立者，一方面無政治成見超然的人士反對美匪建交，一方面參眾兩院參加作證的現任國會議員也都反對美匪建交。這幾位份量之重無異給伍爾夫當頭打了一下悶棍！

再就二十二人中其餘十六人言，因受召集人聽證命題先入為主的影響，在心理上都作美對匪建交是既成事實的假定，故多數祇作與匪建交應作如何保留或附帶那些條件的考慮。此中主張無條件立即與匪建交者，除布魯金斯研究院研究員鮑大可、亞洲學社副主席巴奈德一對難兄

難弟之外，還加上一個訪匪歸來受匪洗腦的前參議員施高持三個不開口大家都會知道他們主張的人。

再進而研究美匪建交之後，作證者所要求的保留是甚麼與所建議的條件又是什麼。這問題的研討重心集中在中美共同防衛條約的效力問題。一部份作證者以為美匪建交，美國與中華民國的條約包括共同防衛條約在內仍然有效。作此主張者，有史丹福大學華裔教授李浩，大律師狄盧，哈佛大學教授史卡拉比諾三人。大家的意見可以以李浩的說明作代表。他以為國際法並未規定，原先跟曾經被承認的政府所訂的條約，在該政府喪失法理上的承認之後，必須自動失效。因為該政府事實上仍控制訂約時該政府實際控制的領域。反對這種說法者，以為美匪建交之後，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必跟着失效，補救之道，祇有由美國總統發表聲明或再加國會通過支持議案以恢復廢約失去的效力。作這主張者，為鮑大可，哈佛大學教授孔傑榮，前參院秘書長范里奧，前美駐華大使館副館長高立夫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可利亞。他們以為，美國與匪建交之後，如不能得匪方不以武力侵台的承諾，可由美國總統發表聲明，表示其對台灣安全之關切，或再由國會通過議案，表示美國有確保太平洋區域和平的責任。他們深信，這一套安排，可以補救中美共同防衛條約的失效。但他們這套主張，經馬里蘭大學華裔教授丘宏達痛加駁斥，說這些建議是故意出賣中華民國。一項兩國正式簽訂的條約可以說廢就廢，所謂總統宣言，國會決議案的效力還有什麼作用可言，這不是故意塞責還是什麼呢？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問題，是伍爾夫這次聽證的關鍵問題，丘宏達的單刀直入，發生了致命打擊的作用。

我們再就六場聽證分別檢討來求一個綜合的結論。第一場是鮑大可與哈佛大學教授史卡拉比諾對峙的局勢，假定我們把辯論雙方分成左右陣線來檢討，可以說這一場的形勢是雙方對峙旗鼓相當。第一場孔傑榮與范里奧絕對左傾，李浩雖為華裔，可是他所主張兩個中國的立場，未免忘記了中國的傳統。在這不利形勢之下，突然跳出一個超然態度的大律師狄盧。他居然高呼「上海公報」有什麼法律拘束力可言？這份公報能比一節新聞公報強嗎？現在因為要實驗它，竟把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有法律拘束

力的條約廢除掉，真是人世間罕有的大諷刺。以後他又跟着就法律立場，痛斥美匪正常化的不當。他一個人的正義呼聲把一面向左倒的第二場，變成了右方的大捷。第三場，給高立夫、泰瑞爾、巴奈德和查可里亞霸佔了去，可說是左傾的全面勝利。可是，第四場，喬治城大學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之克萊恩掌了大旗，賓夕法尼亞大學華裔教授張旭威、辛頓、丘宏達躍馬上陣，把右方在第三場上的損失，亦以全盤勝利的形勢拉平了。最出召集人意外的，是第五場跳出了一位台灣去的美商溫嘉書，第六場出席的現任參議員羅士。這兩個人在最後兩場唱的壓軸戲中，可說是把召集人最先設計的陰謀，一掃而光，發現了美國人還是美國人，公道自在人心！我願把這兩位作證的內容，略述其概要。

(四) 選擇特介

我們先說溫嘉書，他是代表台灣美國商人去出席作證的。他一開口就反對美國與匪關係正常化，尤其反對犧牲了台灣去跟共匪正常化。他強調中美共同防衛條約是美國人在台灣投資的保障。此約象徵安定，安定是美國商人在台貿易的要素，故此約絕對不該廢。去年美國跟中華民國的貿易總值達四十八億美元，跟匪貿易祇有三億三千万美元。或有人說，與匪建交之後，美對匪貿易亦可增加。溫嘉書以為即有增加也一定有限，主要原因共匪貿易是政治性集中控制的，是「非市場制度」的，與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格格不能相入。目前共匪政策，不接受外商投資，他們與外商接觸，祇局限在廣州貿易展覽會中。美國一旦跟共匪建交，台灣受到威脅，美商利益必一落千丈，想跟共匪拉貿易新關係，實無利益可圖。目前美商在台灣投資可以百分之一百擁有自己的事業，這是在亞洲其他國家做不到的。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工廠建築土地的所有權，他們想怎樣推銷自己貨品就可怎樣推銷，他們想採用任何方法任何技術來提高產品品質的標準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旨做。美國人在亞洲其他國家享受不到這樣的自由。他們更可以按照商務狀況的需求，雇用或辭退員工；他們可以訓練工人，並可以進行研究發展工作，派員赴國外深造，有所發明可以取得專利權。這也是亞洲其他國家所不及的。現在美國政府要放棄這樣一個美商最有利的友邦

，去跟與美商利益絕對背馳的共匪建交，沒有一個在台做生意的美國人不反對此舉的。

其次說到羅士，這位參議員的到場作證，真可說發生了一鳴驚人的效果。亞太事務小組所隸屬的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查布勞基，也可說是伍爾夫的頂頭上級組織的主持者，聽見羅士作證，專誠趕來聽證，聽畢表示，羅士所說的就是他想說的，十分欽佩。足見羅士這番話，入情入理，具有鉅大說服力量。

羅士作證，開門見山，表示他把共匪所提建交三條件看作純粹勒索行為，美國應堅決拒絕。他主張美國採取這個立場，是就美國國際關係三種角度考慮決定的。

羅士建議的第一個角度，是就美國在東亞利益有關的全盤政策着眼。他以為美國對華承諾是美國力量留在東亞地區的表示。美國從越戰中脫身出來之後，東亞諸邦，特別是日本，懷疑美國這個盟邦是否可靠的心理日見增長。而最近美軍撤離韓國的決策，更動搖了這些國家對美國能誠意合作的信心。現在美國又要背棄中華民國，而其背棄的理由，並非中華民國對美之不忠，而是美國不勝中共的勒索！羅士說，我們試站在東亞國家的立場來看美國，必定會把美國看成一個朝三暮四、無信用的國家！

羅士建議的第二個角度，是就美、俄、匪三角關係作考慮。他以為美國對付這兩個共產國家，最聰明的辦法是利用它們的矛盾而不參加它們間的矛盾。換言之，美國祇應在中俄共鬥爭中得漁人之利，不應該愚笨到實際偏向一面參加它們的鬥爭。因此，美國背棄台灣與匪建交就應該看做在中俄共鬥爭中採取了偏向一面的愚笨步驟。更何況，假定美國對中華民國二十多年訂約的盟邦，可以因減少了利用價值而棄之如敝屣，共匪拉美國共同對付蘇俄安得不深具隨時有被美國遺棄的戒心！

羅士的第三個角度，從美國對華政策本體着眼。他以為美國與匪建交，並不是解決美國對華一切糾紛的結束而是美國對華問題增加無量數糾紛的開始。中共將利用美國苟安心理的弱點，得寸進尺，一個問題接上一個問題，步步進逼，使美國在東亞無迴旋餘地。羅士斷定，實際中共對台灣問題，雖態度堅強，倘然有符合他們某種利益的機會到來，他們仍有改變路

談的可能。例如過去的華沙談判，匪方堅持美方不放棄台灣，什麼都不能受美國的談判。

因此，羅士結論，對付中共這樣一個對手，美國的立場必需堅強、肯定而有耐性，並必需確證美國是一個言而有信的國家。他贊成「德國模式」，承認兩個中國是最符合現實情勢的美國對華政策。在不犧牲中華民國跟美國的關係限制之下，美國願承認中共，在相互的利益下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相信，這種立場，可望得到美國人，美國盟友以及中國人包括中共在內大家的同意。因此，他說，大部份美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看着當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祇作權宜應付的考慮不取基於原則應取的步驟，深感不安。

五代庖作結

檢討了六場聽證之後，我們發現伍爾夫要達成他研擬「台灣安全決議案」草案，提供國會參考的目的，似乎越開離題越遠了。美國國內外政治的演變，與蘇聯、美、蘇談判以及白宮所提能源法案與中東和談引發之糾紛等重要問題日見嚴重，與「匪關係正常化」已非白宮與國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這個聽證會已呈雷聲大雨點小的現象，可能會長期擱淺下去。

可是在這間歇期間，衆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查布勞基或者聽了羅士作證，受到感動，竟轉輾請託友人邀請過去會熱心參加共匪工作深受良心自責懊然悔悟，今成堅強反共學者的林邁可博士，請他把六次聽證會作證者的證辭，作綜合分析提出一項評論性的報告，送交亞太小組各委員參考。

林邁可的這份報告，可以說大義凜然，把所有袒匪者的論點一一駁斥得體無完膚。他先一般指出，作證者都沒有想到為什麼共匪口口聲聲要「解放台灣」的真理由。他說，共匪要消滅台灣精神上給它的威脅是唯一作這表示的理由。因為台灣提供在台灣無產階級的生活享受，遠超過以支持無產階級利益為號召的中共在中國大陸上所能提供的。因此，台灣的繁

榮變成中共必需消滅的威脅。

他對鮑大可立論的荒謬，斥責不遺餘力。鮑大可說，如果美國不接受共匪三條件與匪建交，匪會投入蘇俄懷抱。林邁可指出，匪之反蘇是既定政策，寫在他們的新「憲法」裡，不能隨意更改的。蘇俄有意在毛匪澤東死後與匪修好，匪因此斷然拒絕了。蘇俄的布里茲涅夫主義鐵定了俄共在共產集團裡的控制權威，使中共因戒懼覆亡而考慮親美，至今形勢未變。祇有美國對蘇屈伏，中共才會無可奈何向蘇俄投降，美國會嗎？

他又駁斥鮑大可以為，美國如激怒匪幫，匪將鼓動各種叛亂以威脅美國之說稱，此項立論建立在荒謬的假設上。鮑大可以為美國如遷就匪方要求作重大讓步，共匪即會自感有避免傷害美國的義務。林邁可指出共產黨員與資本主義列強交往，絕對不會有這種義務感。

林邁可復駁斥鮑大可、泰瑞安、孔傑榮、懷丁等以為共匪懾於國際輿論之監視不敢侵台的共同看法。他舉二次世界大戰前之日本為例，他說，那時候美國國務卿赫爾一再強調日本懼世界輿情之督責，決不敢發動侵略戰爭，其結果如何呢！

此外林邁可復駁斥巴奈特共匪可能與我中華民國和談之說稱，中國的孔孟傳統與孫中山先生的理論可以跟馬列主義妥協共處，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他又復斥責泰瑞安等預測與匪關係正常化後，可以促進美匪多方面之接觸，例如記者採訪之便利，留學生交換智識的頻繁等構想，指這些都是不了解匪情極度無知的表現！

綜合言之，林邁可的這份報告，完成了雙重任務：它一方面代這次聽證會作了一個糾正偏見合情合理的持平結論，另方面則有了他這份結論之後，伍爾夫再要給這項聽證會做他預謀的結論，即使不算是畫蛇添足也必將失去其原計劃的效用了！

(六) 兩股主流

，已成不必多加考慮的因素。因為這次聽證會之不能達成伍爾夫預期效果，已成不可挽救的必然結果。同時，這次聽證會因召集非時，不能配合美國面對政情的現實發展，故在六場聽證發展過程中，美國新聞媒介只把這些聽證一筆帶過，都未予以重視。我國幸有中央社與各報駐美的自己記者，他們都能抓住我們自己的新聞角度，有始有終地把六場聽證作了詳盡的報導。他們的這次表現，使我們在國內的讀者深感此後國際事務的發展中，我們中國有了自己的眼睛與耳朵了！因為，這次美匪關係的聽證會，跟着國際政情的浪潮起伏看，一般新聞記者把它排在二三流非主要的新聞堆裡去未可厚非；可是，集中美國的關心當前中華民國國運興替的學者、政治家，以及各行各業對這問題有切身利害關係者於一堂，討論中美關係的轉變，就中國人的立場估計，却是一個異常難能可貴的好機會，中國記者應該牢牢把握住它。我真高興我國駐美的記者們能把這些發言人作證的資料大小不遺地供給我們。因為這些資料之可貴，不在其對解決召集人原定的要求有否貢獻，而在幫助我們看到美國人對中國問題從各種角度中反映出來的態度與意見。

筆者試把六場作證發言人的意見分類統計，發現其所提出的問題竟達二十六種之多。問題這樣龐雜，似難作類別的統計。然去無留青，我們還可以清理出兩股主流：一股是配合召集人召開聽證的要求，主張接受匪方要挾的三條件，與匪建交，至台灣的安全，則應另以其他方式取代中美共同防衛條約以確保之。另一股主流則強調美國絕對不應犧牲它與中華民國的傳統國交去遷就共匪與匪建交。即令與匪建交為既定國策，仍應暫與雙方同時建交以待中國方面統一政府之產生。作前一主流主張最烈者為布魯金斯研究院的鮑大可，為後一主流主張之中流砥柱者為喬治城大學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的克萊恩。我想再撮要簡述此二人代表兩股主流對立的論點。

鮑大可此次聽證後十月八日在華盛頓郵報專文重述他的主張。他先就美國的立場說話。他說很多美國朋友要求美國信守承諾，不能放棄台灣，說這與美國的國際榮譽有關。他指出，這些美國朋友忽視了美國的現實。儘管有中美共同防衛條約的存在，在台北與北平隔海對峙的局勢中，美國

人決不願意冒生命、財產、自信心喪失的危險，再踏越南的覆轍。即使白宮有履行條約承諾的企圖，國會也有權制止其作任何軍事行動。因此，美國政府到了這個關頭，無法實踐其承諾，尚有何榮譽可言。

鮑大可再就共匪立場說話。他說，共匪代表中國，中國歷來備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自十八世紀以來，忍受了無盡的屈辱。北平心目中，美軍駐留台灣就是這種形式。因此，李匪先念會向美國人說，華盛頓欠北平一筆債，就指美軍駐台是侵略行為，暗示有非常嚴重的戰略意義。李匪以為，中國祇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美軍駐台，客氣些說，是華盛頓欠北平的一筆債。鮑大可再進而就台灣的現狀說話。他說，台灣日見富強，已有自衛力量，不需美國幫助。台灣的軍事實力獨立強大，經濟實力豐裕精進，北平絕無武力侵台的能力。更何況，北平現在既想拉攏美國，又要與日本及東南亞各國修好，武力侵台，將影響爭取這些國家的成效，它也不肯輕易嘗試。因此，中美共同防衛條約是不需要的累贅。

因此，鮑大可以為美國應因承認一個中國而與匪關係正常化，因避免干涉中國內戰而卸去共同防衛台灣的責任，至台灣問題應由北平與台北共同努力求其和平解決。他以為，或者在一個中國之內使台灣享有前所未有的自治權是一個解決辦法。

再說克萊恩，他力斥鮑大可等祇知遷就現實，渾忘美國立國有其立國的原則必須維護。就中國問題整體言，克萊恩以為中華民國是一個有權生存的國家，並且它是正向建立一個使全體人民享受充份主權的現代國家目標邁進而見光輝成效的國家。現在我們美國竟想欺己欺人，無視這樣一個國家的存在。這是再荒唐可笑也沒有的一種措施。我們硬說這個國家沒有國家的原則，是可恥的武斷。同時，舍棄這樣一個友邦，想另拾新歡的新友邦，其政治現況的蹂躪人權，奪權紛亂，剛與中華民國成一尖銳的對比。想跟這樣一個國家調整關係正常化，真有些像縹渺無稽的神話。

克萊恩在聽證會中提請大家注意「上海公報」並沒有提美國應與匪建交的建議，現在美國政府如強認有此承諾而與匪建了交，勢必鼓勵匪方武力侵台，使中華民國遭受被出賣的損害，實為不可原諒的驚人短視！

克萊恩接着在聽證會中重提他一貫主張的「兩個中國」式實際也是接

近「德國模式」的辦法，做美國當前對華政策應取的規範。他認為，這應該算是美國自己的方式，那就是：不論那一個政府，祇需它明顯地能夠管轄那部份領土並且統治這部份領土內的人民，美國就承認它是這部份領土與人民的政府。因此，美國目前應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國交及跟它所訂的一切條約關係，同時亦可與匪偽政權建交。這是美國面對現實對華暫取的態度，以待中國統一政府之產生。克萊恩以為，這是在可見的將來，美國在應付中國問題上，符合美國的道義和政治原則唯一現實的基礎。

(七) 結論

上述兩個人可以說是代表今日美國兩種爭論未決的主張。鮑大可一派代表了與現政府合流者的意見，克萊恩一派是糾正現政府偏執者的看法。我們持平予以評判，深感雙方都過份遷就現實，沒有把握到實際世局嚴重的本質。他們都沒有正確認清匪佔大陸是一個要以中國大陸為根據地，達成他們假無產階級革命為號召的赤色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企圖。鮑大可暴露了他們懼戰的怯懦與推卸同盟責任之卑鄙不足道的動機，固不值我人之一駁。即克萊恩兩個中國的構想，亦仍反映了美國人避不敢談他們實應面對的反共現實問題的姑息心理。

當我檢討這次美國衆院聽證中國問題所得結論，陷入這種失望的灰暗情緒中時，外電傳來克萊恩新著「一九七七年世界勢力評估」一書殺青問世，招待記者，發表他在這本書裡對世局的新看法，建議一套新辦法。我看過遭報導後，正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深喜美國尚有人真能舍功利而注重道義原則！

克萊恩在這本新著中，主張美國應把外交政策的重點，放在建立一個有效的聯盟以制衡來自蘇俄和中共的威脅。他建議的這個聯盟，有異於一般傳統的聯盟，而是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由經過選擇的國家自動形成的一個維持海洋間聯盟體系安全的組織。參加這聯盟國家，克萊恩建議，應選定有能力有志願對抗蘇俄與中共勢力擴張的重要國家。他列舉了「具有類似的政治與社會秩序以及共同目標和對國際危機持有共同觀點」的十個國家，為這個聯盟的核心。這十國是：美國、加拿大、西德、法國、英國

、義大利、以色列、日本、中華民國與澳洲。克萊恩又建議，以這十個國家為這聯盟的核心，另外再選定十五個國家為外圍候選成員，構成海洋聯盟大團結，「應可發揮相當於蘇俄在歐亞與中共在亞太地區一倍的實力」，以與抗衡。

克萊恩在本書中特別提到我們中華民國。他說，中華民國憲法所闡明的建國目標，要建立一個符合現代標準的民主政府，顯為中共所敵視。中華民國今日的地位，政治之進步，經濟的繁榮，使它與日本一樣有資格作為一個海洋聯盟的亞洲堅強據點。克萊恩更提請讀者注意，中共的威脅並不限於它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其統戰陰謀的滲透蠶食，威脅之大，倍於軍事。他又指出，莫斯科與北平雖對摧毀多元社會所取的方式不同，但它們信守的主要策略，同樣是製造敵視美國在各地影響力的情勢，以及敵視美國的社會與政治結構的存在。

克萊恩這套世界戰略形勢的新觀念，的確有令人耳目一新振聾發聵的影響，但其影響牽涉過廣，超出了本文討論範圍之外。筆者之所以簡介此書，祇能取其端正了中國問題看法的新角度一點，表示我的欽佩。它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問題，不是一個國家的內戰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世界反共戰爭壁壘分明的反共產者與共產主義者兩個陣營對峙決勝敗的大問題。我們的反共戰爭，不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人民認不清，甚至部份我們自己中國人，也都把它看成一場中國的內戰，因此厭戰心理把這場連年累月打不出結果的戰爭，認為打得無聊，打得沒有意義。實際，很少人看到，這場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爭人權、爭自由價值最高、最有意義的偉大戰爭。中華民國今日打的是這場偉大戰爭的前哨戰，並且已經打得有聲有色，祇等到時機成熟，像克萊恩這樣西方的先知先覺者群起而喚醒了西方現實主義者的迷夢，重振全世界反侵略戰鬥陣營時，我們中華民國幾十年來衆志成城而不捨打下的反共基礎，才發揮它對全人類福祉的超人貢獻！

現在美國與匪「關係正常化」的高潮雖暫沉寂，然問題的嚴重性依舊存在。願國人正視世局嚴重的本質，認清我們打的是世界反共戰爭的前哨戰，藉以堅定我們領導打這一場全世界爭人權爭自由神聖戰爭必勝必成的信心。